

中国贫困区与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相关性研究

吴小雪, 侯本柳 (西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四川绵阳 621000)

摘要 研究贫困与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相关性, 对缓解贫困与传统村落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 Arcgis10.0 地图绘制技术和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等手段, 对我国贫困区与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我国贫困地区内存有明显的传统村落分布热点, 浙江省与福建省对传统村落与文化保护措施实施较早, 因此有传统村落热点分布。同时贫困地区对传统村落的热点形成有明显影响。

关键词 中国; 贫困区; 传统村落; 空间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 TU 98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8)27-0003-03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Poverty Area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U Xiao-xue, HOU Ben-liu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Abstract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verty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great significance to alleviating poverty and protect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or areas and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was developed in our country by adopting Arcgis10.0 mapping technology and data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obvious distribution hot spot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poor areas in China, Zhejiang and Fujian Province implemented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measures early, so there were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hot spot distribution here. At the same time, poverty are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hot spot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 words China; Poor areas; Traditional villages; Spatial correlation

从早期以收入衡量贫困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多维贫困理论, 贫困问题已成为地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作为我国社会地域发展不平衡的表征, 学术界对贫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从致贫因子^[1-2]、致贫机制^[3-5]的定性剖析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6-7], 为我国扶贫措施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 我国中西部与东部的经济差异明显, 国家级贫困县连片分布于我国中西部。针对贫困问题的研究都致力于缓解贫困带来的不利影响, 而贫困对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作用始终被忽略。大量传统村落分布在我国中西部以及民族地区^[8], 大尺度上与我国的贫困地域存在空间上的耦合, 却鲜有贫困与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相关性的研究。为此, 借助地图绘制软件和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以我国贫困地区和传统村落分布热点为研究对象, 探究贫困地域与传统村落分布热点之间的关联性, 科学地认识贫困对传统村落保护的价值, 有效地做好传统村落分布热点识别, 以达防止破坏的目的。该研究选择国家尺度进行, 以为我国扶贫与传统村落保护之间的平衡奠定理论基础。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对象 为找出贫困地区与传统村落分布热点区的空间相关性, 基于国家尺度(不包括台湾及附属岛屿)进行相关研究, 我国的贫困空间分异明显, 传统村落分布存在明显热点区域, 因此以我国作为研究对象符合实际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2012 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 592 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 均分布在中西部地区。2011 年国务院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中划定 11 个连片特困地区和 3 个实施特殊扶贫政策的地区(图 1),

这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农民人均纯收入 2 676 元, 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在全国综合排名最低的 600 个县中, 有 521 个在片区内, 占比 86.8%。

1.2 样本数据与说明 该研究的数据主要是中国传统村落网提供的各批次贫困村落名单, 到目前为止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等联合公布 4 批传统村落, 各批次共 4153 个村落。数据显示, 国家认定的传统村落数量逐批上升, 2016 年公布的第 4 批次数量最多。将传统村落作为点要素绘制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图(图 2), 由图显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每批次的传统村落分布热点区域几近相同, 并在热点区域呈集中分布; 二是各批次传统村落热点分布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 两极分化现象明显; 三是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密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突出; 四是受地理环境因素影响较大, 中西部山区传统村落分布明显较多。

2 分析方法

从点与面 2 个空间层面展开分析, 从分析技术上讲, 点层面是精确的传统村落所在地, 面层面包括 14 个连片特困区。该研究尝试在点层面上分析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数据, 利用 Arcgis10.0 的核密度分析工具描绘各批次空间格局的变化过程, 并以此来表示传统村落热点分布, 然后与面要素的贫困片区进行叠加, 分析两者的空间相关性。核密度估计是热点和冷区识别与分析的探测性工具, 该方法可以得到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密度连续变化的图示, 并根据颜色的变化判断传统村落的聚集性, 即判断是否为分布热点。该研究使用 Arcgis10.0 中内置核密度分析工具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 选择搜索半径为 2 km。2012—2016 年 4 个批次传统村落的核密度分析结果如图 3 所示。

3 贫困区域与传统村落分布热点相关性分析

3.1 贫困区域内存在明显的传统村落分布热点 通过传统

作者简介 吴小雪(1992—), 女, 四川都江堰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城乡规划学。

收稿日期 2018-05-25; **修回日期** 2018-06-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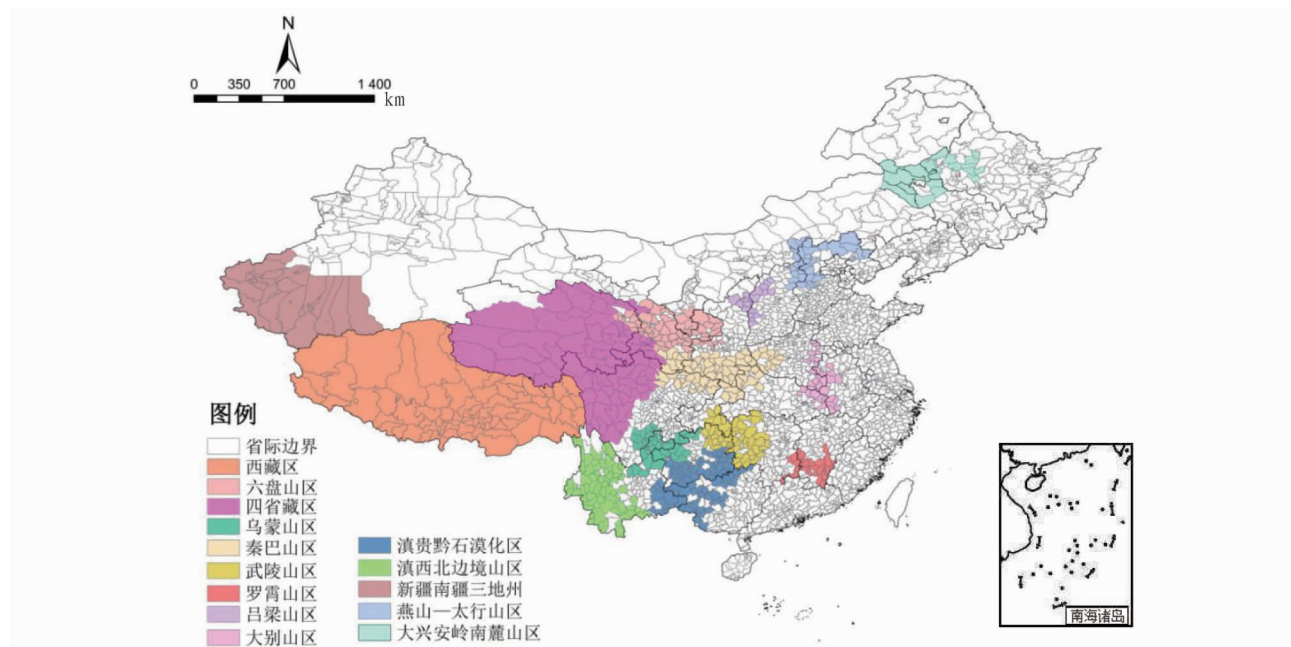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空间分布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verty areas 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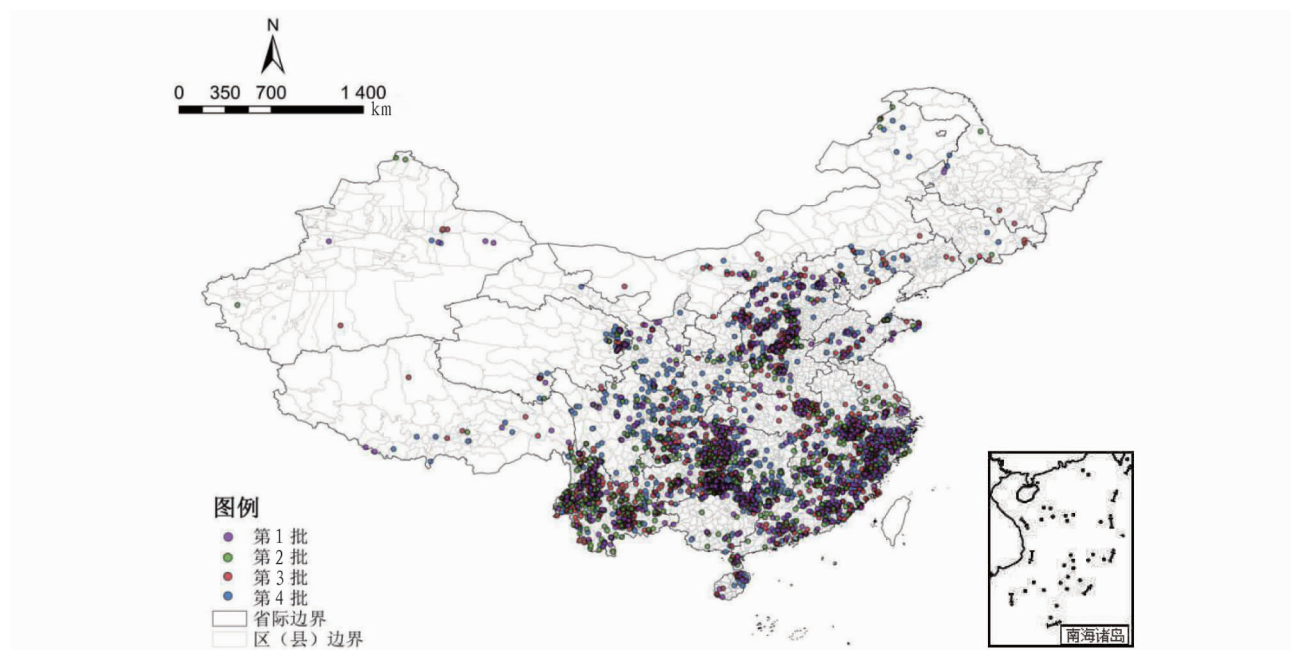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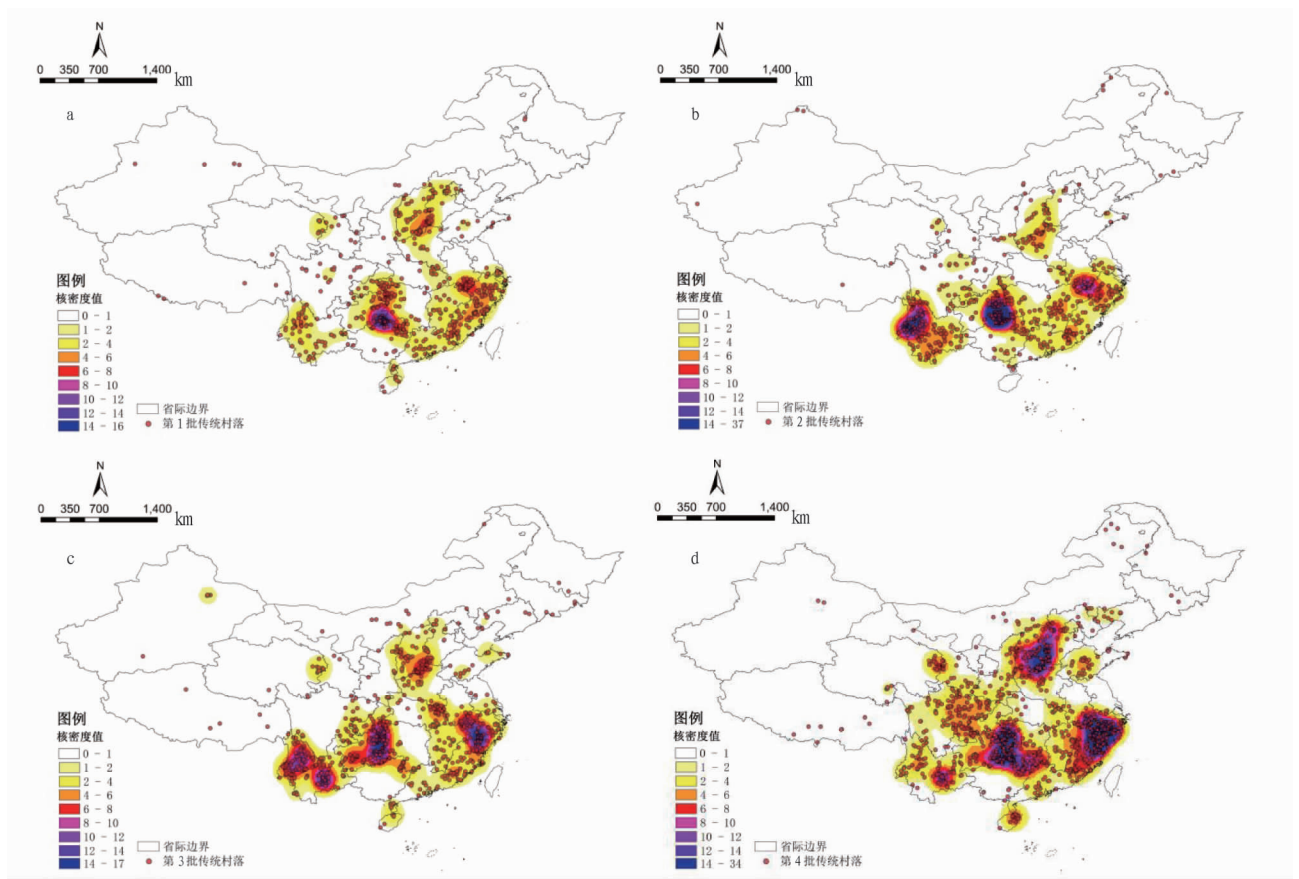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村落地图描绘分析,我国作为一个贫困空间集聚度高的国家,在连片的贫困区域内存在着明显的传统村落分布热点。从传统村落分布热点看,其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山西、浙江等地(图 3)。从第 1 批至第 4 批核密度分析图可以看出,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我国南半部,贵州、广西与湖南交界处一直是分布热点,且在我国滇桂黔石漠化连片特困区内,云南省西北部的传统村落分布热点位于滇西北边境山区,亦是我国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山西省南部的热点位于平顺县、壶关县、武乡县、和顺县及左权县等贫困县密集区;四川省中部的热点则位于秦巴山、乌蒙山连片特困区与四省藏

区的包围区内部。贫困片区内经济发展缓慢,传统建筑和工具等的更新受到阻碍,贫困人口自我保护意识和交通可达性低导致外界文化的传播难度加大,使得传统文化得到长期延续。除贫困片区外,从每一批传统村落核密度分析图中可以看到在浙江省和福建省也存在热点区域,并且热点范围逐渐扩大,被认定的传统村落数量逐渐增加。两省对传统村落与文化的保护意识萌生较早,在其被破坏之前及时进行重点保护,使其价值得以保存。

3.2 传统村落分布热点的形成与贫困区呈明显相关性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核密度分析图展示的是传统村落分布密度



注:a,b,c,d 分别代表第 1、2、3、4 批

Note:a,b,c,d stand for the first,second,third and fourth batch respectively

图 3 传统村落的核密度分析

Fig.3 Nuclear density map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在地理上的连续。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传统村落分布密度减小,热点有向贫困区扩散的趋势。如图 3 显示,滇桂黔石漠化连片特困区的传统村落热点北部向武陵山连片特困区延伸,而南部有向广西昭平县、富川瑶族自治县和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等贫困县延伸的趋势;滇西北边境连片特困区的热点向其片区的南部延伸;浙江省和福建省的热点向罗霄山和大别山连片特困区扩散;山西省的传统村落分布热点向燕山—太行山、吕梁山、大别山等连片特困区扩散明显。随着传统村落数量的增加,其热点区域中心密度越来越大,热点覆盖范围也逐步扩大,其空间扩散始终倾向于贫困区域。由第 3 批传统村落核密度分析图可知,作为扩散目标区域的滇西北边境山区南部已经单独形成一个密度制高点;大别山区由于浙江省和山西省热点的扩散作用形成新的热点区域;第 4 批传统村落数量急剧上升,其核密度分析图显示四川省东部形成大范围密度较高的地区,此片区处于秦巴山、武陵山、乌蒙山连片特困区和接受特殊扶贫政策四省藏区的包围区,其传统村落分布密度的升高验证了贫困对传统村落分布热点区域的扩散起指向作用。

4 结论

贫困地区与传统村落分布热点呈明显相关性,同时贫困地区影响传统村落热点的形成,即贫困区对传统村落分布热点的延伸具有吸引作用。贫困地区落后的社会经济使得村

落风貌更新节奏缓慢,从而为村落传统风貌的保护提供有利条件。我国现阶段处于深度贫困的山区有相对封闭的区域环境,险要的地形以及不太便利的交通等都为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重要条件。贫困问题作为时代发展的阻碍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贫困的治理,学术界和实务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实务界认为对贫困地区实施扶贫措施,努力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环境,实现贫困人口经济脱贫即为贫困治理。而学术界更注重脱贫的可持续性,倡导针对性扶贫,不同维度的致贫需配合实施相应的措施,传统村落受保护的过程亦是扶贫的过程。将贫困地区村落的传统风貌和特色文化等保存下来,通过发展旅游或特色产业对贫困地区实现脱贫是有利的。正确认识贫困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十分重要,应该努力平衡反贫困战略实施与传统村落保护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陈辉,张全红.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贫困精准识别及精准扶贫对策:以粤北山区为例[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3):64-71.
[2] 张全红,李博,周强.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测算、结构分解与精准扶贫[J]. 财经研究,2017,43(4):31-40,81.
[3] 杨龙,李萌. 贫困地区农户的致贫原因与机理:兼论中国的精准扶贫政策[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33-40.
[4] 任慧子,曹小曙. 隐性乡村贫困空间探析: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J]. 地理研究,2012,31(5):955-963.
[5] 杨毅,张琳. 环渝连片特困区精准扶贫效益评价及增进策略:基于 SEM 模型的实证分析[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3(5):53-62.
(下转第 12 页)

表 2 农膜使用水平的方差分解表

Table 2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use of agricultural plastic film			
Period	S. E.	lny	lnx
1	0.126 408	100.000 00	0.000 000
2	0.199 211	99.827 65	0.172 353
3	0.241 279	99.139 13	0.860 874
4	0.264 230	97.727 13	2.272 868
5	0.277 752	95.640 01	4.359 988
6	0.287 305	93.151 55	6.848 453
7	0.295 285	90.577 32	9.422 676
8	0.302 609	88.137 70	11.862 300
9	0.309 614	85.935 44	14.064 560
10	0.316 421	83.990 59	16.009 410

一是农膜使用的自我示范效应显著。从方差分解可知,虽然农业现代化对农膜使用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农膜使用对来自自身的影响最为明显。说明农膜使用自 1978 年从日本引进以来,目前在福建省还处于技术扩散阶段,农膜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我示范效应的影响。这从福建省 1992—2015 年稳步提高的农膜使用量可以得到印证。

二是农业现代化对农膜使用的带动效应稳健。从协整关系分析及脉冲响应分析可知,农业现代化对农膜使用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影响平稳。说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可以稳定地促进农膜技术的推广及使用。按照目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预期,如果不对农膜使用进行人为干预的话,农膜使用量还会呈现持续稳定增长的趋势。由于农膜使用是农膜污染的来源,用农膜使用来表征农膜污染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膜污染的累积,即福建省目前的现代农业发展并不符合生态文明,离两型农业的实现还有段距离。

三是农膜使用对农业现代化的规模效应递减。从脉冲响应分析可知,农膜使用对农业现代化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不大且影响逐步减小。说明随着农膜技术的不断普及,农膜使用量的不断增加,农膜覆盖栽培技术的增产增效功能在慢慢减弱;农膜使用的规模化边际收益递减,依靠农膜使用规模的扩大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是不可行的。

3.2 建议 一是坚持走两型农业的发展道路。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农业,降低农业现代化对农膜使用的带动效应。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两型农业,需要政府采取措施主动干预,促进其和谐发展。要克服唯 GDP 论,建立符合科学发展的绩效评价考核体系;要建立发展两型农业的法律法规支持体系,包括两型农业生产

技术标准、资源循环利用、污染治理等方面;要强化科技支撑,开发推广绿色肥料、生物农药、可降解农膜等环保型农业生产新技术;要加大对农民、企业等农业生产主体的培训力度,引导其发展符合两型要求的农业产业。

二是开展对农膜污染的主动防治。随着农业现代化推进,农膜污染日益加剧,加强农膜污染防治势在必行。要树立环保意识,降低农膜使用的自我示范效应;要采取主动作为,避免农膜使用的规模效应。要相对减少农膜使用量,通过采取合理的农艺措施,如“一膜两用/多用”、早揭膜、侧膜栽培技术等;要建立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体系,加强农膜的回收管理,如禁止生产和使用厚度小于 8 μm 的农膜、推广人工加机械捡拾等;要开展科技攻关,积极开展可降解无污染农膜、纸质地膜等替代产品及农膜回收机械的科技攻关和技术研发;要做好农膜残留污染监测及危害评价,为开展残膜治理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 尹成杰. 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思考[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 29(3): 4-9, 110.

[2] 焦若静. 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研究[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5(2): 83-86.

[3] 刘勤, 薛颖昊, 靳拓, 等. 2014 年中国地膜使用报告[EB/OL]. (2016-07-17) [2016-09-13]. http://www.moa.gov.cn/sydw/stzyzz/hjbh/201607/t20160714_5206689.htm.

[4] 杜江. 转型期中国农业增长与环境污染问题研究[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09.

[5] 魏欣, 李世平. 基于农户行为的农业面源污染机制探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2(6): 26-31.

[6] 肖萍. 论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及立法完善[J]. 江西社会科学, 2011, 31(6): 214-219.

[7] 马彦, 杨虎德. 甘肃省农田地膜污染及防控措施调查[J].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15, 31(4): 478-483.

[8] 周琳. 经济发展程度对农用地膜污染处理的影响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14, 42(19): 6353-6355.

[9] 马少辉, 杨莹. 新疆兵团农田地膜污染现状调查与治理技术分析[J]. 安徽农业科学, 2013, 41(35): 13678-13681.

[10] 杜晓明, 徐刚, 许端平, 等. 中国北方典型地区农用地膜污染现状调查及其防治对策[J]. 农业工程学报, 2002, 21(z1): 225-227.

[11] 董合干, 王栋, 王迎涛, 等. 新疆石河子地区棉田地膜残留的时空分布特征[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3, 27(9): 182-186.

[12] 徐刚, 杜晓明, 曹云者, 等. 典型地区农用地膜残留水平及其形态特征研究[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05, 24(1): 79-83.

[13] 杜雯翠, 张平淡, 朱松. 农业市场化、农业现代化与环境污染[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8(1): 1-9.

[14] 苏杨, 马宙宙. 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对策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16(2): 12-18.

[15] 苏杨, 马宙宙. 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其对策[J]. 调研世界, 2006(6): 7-11, 5.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福建省土地资源概况[EB/OL]. (2009-12-10) [2016-09-13]. http://www.mlr.gov.cn/tldsc/zygk/200912/t20091210_129083.htm.

(上接第 5 页)

[6] 郭辉, 王艳慧, 钱乐毅. 重庆市黔江区贫困村多维测算模型的构建与应用[J]. 中国科技论文, 2015, 10(3): 331-335, 347.

[7] 尚卫平, 姚智谋. 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研究[J]. 财经研究, 2005, 31(12): 88-94.

[8] 刘大均, 胡静, 陈君子, 等. 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4): 157-162.